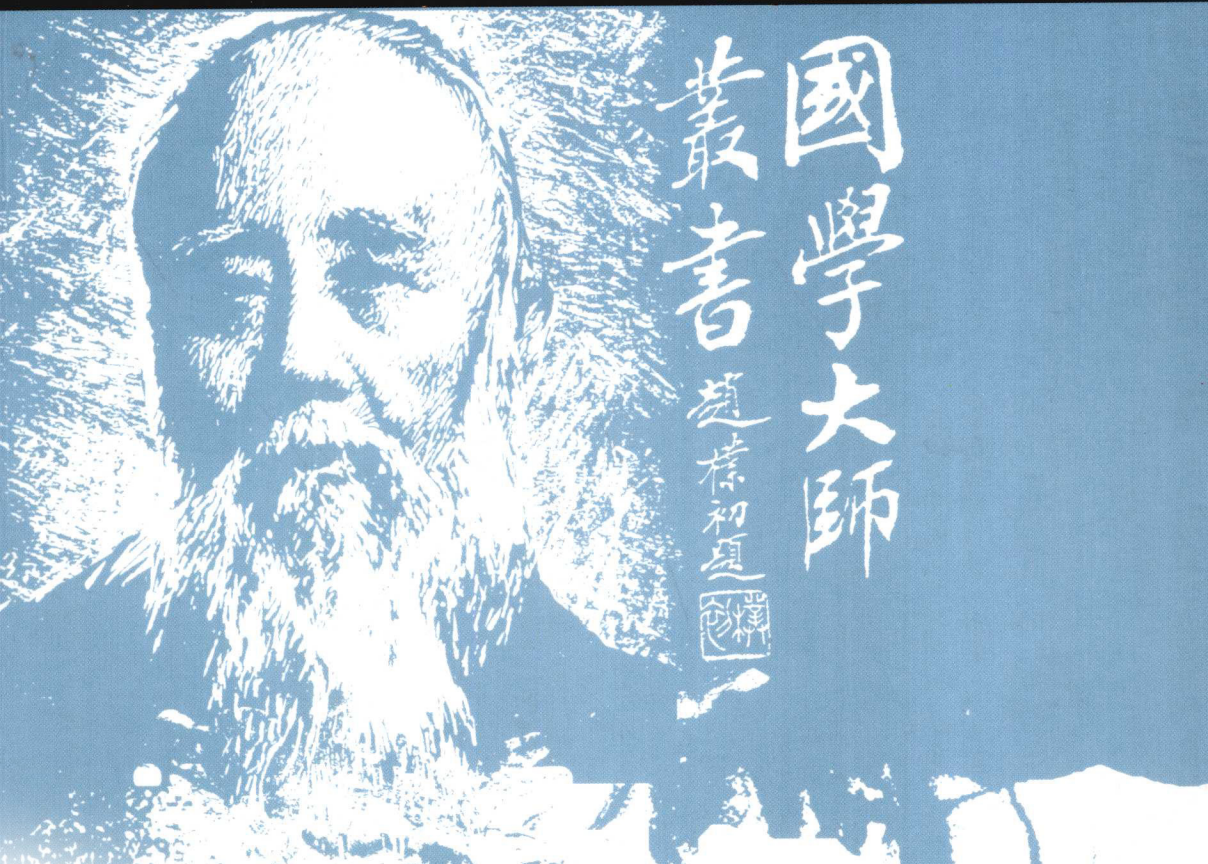


馬一浮集



國學大師
叢書

趙樸初題



《國學大師》你繞不開的一座高峰

國學巨匠，百年經典，新眼指路！

大師們以他們獨特的藝術風格，為中國文化增添了瑰麗的色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马一浮评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一浮评传/马镜泉、赵士华著. —2 版.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3

(国学大师丛书)

ISBN 978-7-80579-360-3

I. 马… II. 1. 马… 2. 赵… III. 马一浮 (1883—1967) —评传
IV. B26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1153 号

书 名: 马一浮评传

作 者: 马镜泉、赵士华

责任编辑: 钱 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 WWW.BHZWY.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5 万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定 价: 22.00 元

书 号: 978-7-80579-360-3

邮政编码: 33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ZONG XU

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总 序

Guo Xue Da Shi Cong Shu

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觥，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覿，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媿，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美。”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

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总 序

Gao Xue Da Shi Cong Shu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CHONG XIE JIN DAI ZHU ZI CHUN QIU

《国学大师丛书》在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就要陆续与海内外读者见面了。

当丛书组编伊始（1990年冬）便有不少朋友一再询问：为什么要组编这套丛书？该丛书的学术意义何在？按过去理解，“国学”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你们对它有何新解？“国学大师”又如何划分？……作为组织编辑者，这些问题无疑是必须回答的。当然，回答可以是不完备的，但应该是明确的。现谨在此聊备一说，以就其事，兼谢诸友。

一、一种阐述：诸子百家三代说

中华学术，博大精深；中华学子，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著称于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诸子百家时代，出现在先秦时期。那时，中华本土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演进，已渐趋成熟，老庄、孔孟、杨墨、孙韩……卓然颖出，共同为中华学术奠定了长足发展的基脉。此后的千余年间，汉儒乖癖、佛入中土、道教萌生，中华学术于发展中渐显杂陈。宋明时期，程朱、陆王……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倡先秦之脉、兴义理心性之学，于是，诸子百家时代再现。降及近代，西学东渐，中华学术周遭冲击，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本其良知、素养，关注文化、世运，而攘臂前

行，以其生命践信。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黄侃、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遂傲然世出！

《国学大师丛书》组编者基于此，意在整体地重现“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之盛况，为“第三代”中华学子作人传、立学案。丛书所选对象，皆为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但治学之法已有创新；他们的西学造诣令人仰止，但立术之本在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但无疑地，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理论又具有其时代的共性。以往有过一些对他们进行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面世，但从没有对他们及其业绩进行过集中的、整体的研究和整理，尤其未把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作为一个“大师群”）进行研究和整理。这批学术大师多已作古，其学术时代也成过去，但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今而远未过时。甚至，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我们至今仍未达其深度，某些理论我们竟会觉得陌生。正如第一代、第二代“诸子百家”一样，他们已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他们，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本身。

对于“第三代诸子百家”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整理，我们恐怕还不能说已经充分展开。《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织编辑，是一种尝试。

二、一种观念：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

纵观历史，悉察中外，大凡学术的进步不能离开本土文化基脉。但每一代后起学子所面临的问题殊异，他们势必要或假古人以立言、或赋新思于旧事，以便建构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学术。这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在每一代学子身上的最好体现。以上“三代”百家诸子，莫不如是。《国学大师丛书》所沿用之“国学”概念，亦当“赋新思于旧事”而涵注现时代之新义。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四杰继



起，矫道统，斥宋儒，首倡“回到汉代”，以表其“实学实行实用之天下”的朴实学风，有清一代，学界遂始认“汉学”为地道之国学。以今言之，此仅限“国学”于方法论，即将国学一词限于文字释义（以训诂、考据释古文献之义）之范畴。

《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此其一；其次，既是中国学术便只限于中国学子所为；再次，既是中国学子所为之中国学术，其方式方法就不仅仅限于文字（考据）释义，义理（哲学）释义便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起来，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和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为经学（即“六经”、实只五经）及文字训诂学；史部为史志及地理志；子部为诸子及兵、医、农、历算、技艺、小说以及佛、道典籍；集部为诗、文。由此视之，所谓“国学家”当是通才。而经史子集会通和合、造诣精深者，则可称为大师，即“国学大师”。

但是，以上所述仍嫌遗漏太多，而且与近现代学术文化史实不相吻合。国学，既是“与西学接触后的中国学术”，那么，这国学在内涵上就不可能、也不必限于纯之又纯的中国本土文化范围。尤其在学术思想、学术理论的建构方式上，第三代百家诸子中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师们，事实上都借用了西学，特别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及与考据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证方法，还有实验方法、历史方法，乃至考古手段……而这些学术巨子和合中西之目的，又多半是“赋新思于旧事”，旨在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范式。正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我们今天使用语言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乃得之于斯！如果在我们的“国学观念”中，将他们及其学术业绩排除在外，那将是不可理喻的。

至此，《国学大师丛书》之“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之意。因之，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固为国学，以探究义理心性为特征的“宋学”及兼擅汉宋者，亦为国学（前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刘

师培、黄侃，后者如陈寅恪、马一浮、柳诒徵）；而以中学（包括经史子集）为依傍、以西学为镜鉴，旨在会通和合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当为更具时代特色之国学。我们生活在九十年代，当取“一代人有一代之学术”（国学）的观念。

《国学大师丛书》由是得之，故其“作人传、立学案”之对象的选择标准便相对宽泛。凡所学宏通中西而立术之本在我中华，并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现代风气之先以及首创新型范式者皆在入选之列。所幸，此举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当今学界老前辈的同情和支持。

三、一个命题：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

中西文明大潮的冲撞与交融，在今天仍是巨大的历史课题。如今，我们这一代学人业已开始自己的学术历程，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规模空前的学术文化积累（其表征为：各式样的丛书大量问世，以及纷至沓来名目繁多的学术热点的出现），应当说，我们这代学人无论就学术视野、抑或就学术环境而言，都是前辈学子所无法企及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功底尚远不足以承担时代所赋予的重任。我们仍往往陷于眼花缭乱的被动选择和迫不及待的学术功利之中难以自拔，而对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则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悟。我们至今尚未创建出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就。基于此，《国学大师丛书》的组编者以为，我们有必要先“回到近现代”——即回到首先亲历中西文化急剧冲撞而又作出了创造性反应的第三代百家诸子那里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困惑与浮躁，我们也该着实潜下心来，去重新了解和领悟这一代宗师的学术生涯、为学风范和人生、心灵历程（大师们以其独特的理智灵感对自身际遇作出反应的阅历），全面评价和把握他们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贯通近代诸子，我们这代学人方能于曙色熹微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我们应当深信，历史是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的，90年代的学人必定会有自己的学术建树。

我们将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从和合与扬弃中把握，于沉潜



与深思中奋起，去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便是组织编辑《国学大师丛书》的出版宗旨。当我们这代学人站在前辈学术巨子们肩上的时候，便可望伸开双臂去拥抱那即将到来的中华学术新时代！

钱宏（执笔）

1991年阳春节初稿

1992年立春节修定





一代儒宗（代序）

袁卓尔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马一浮先生（1883—1967）名浮、字一浮，号湛翁，晚年自署蠲叟或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他于儒学、佛学、文学、哲学无所不精，博综百家，如海纳百川。而首崇儒学，精研义理，道德风范，一时无两。故其生平交游如谢无量、熊十力、苏曼殊、李叔同、夏丏尊、朱光潜等，皆一时名流。海内学子，闻风归来。其中夏承焘、丰子恺等虽未从师，亦以后学晚辈自居。

马先生天分极高，学识渊博，常使接近他的人产生倾倒、震惊、崇拜的心情。丰子恺在《桐庐负暄》一文中，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他说：“与马先生谈话，如同呼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继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又说：“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原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



代
序

Ma Yi Fu Ping Zhuan

能背诵出原文来。”而弘一法师则惊叹“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可见对马先生何等的崇拜！

我认识马先生，是因为我父亲袁心聚是马老的学生（确切地讲，应称门人或弟子）。我不知父亲是何时从师的，估计在1920年前后。近见马老较晚的弟子乌以风教授撰文提到：“袁心聚从先生学最早，奉侍甚恭。一生尽力教育，不干仕宦。在同门中，以行履笃实见称。”可见父亲是马老最早收录的大弟子。

回想起来，从我记事之日起，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位“马先生”最受父亲的尊敬。这位“马先生”在我们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逢年过节，父亲都要送去“节敬”；有了好吃的时鲜，也必定要首先孝敬马先生。有时马先生甚至还左右我们家庭的欢乐与烦恼。每次父亲从马先生那里回来，我们都得窥测一下他脸上的阴晴。如果他精神焕发，笑容可掬，一定是论学有了收获，得到先生的嘉许了；他就会在饭桌上讲述马先生家的所见所闻，一顿饭便吃得谈笑风生，皆大欢喜。如果他垂头丧气，满脸阴云，那肯定他又发表了什么谬论，受到马先生的批评了；这顿饭便会吃得非常沉闷，连母亲也不敢动问，我们小孩子更是连大气也不敢出的。

据母亲讲，父亲拜马先生为师时，已经做浙江第一师范的教务主任了。他是纯粹出于仰慕马先生而要求从师的。据说马先生收录弟子要求很严，极重对方的学识、人品、气质、操守。所以他收录的弟子之中，有不少是立身处世已有一定成就的人，有的已是博士或教授。父亲讲过一位寿毅成先生从师的故事。寿先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其父系浙江诸暨县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生平最钦佩马先生。寿老先生病危时，致书远在美国求学的儿子，叫他以学业为重，不必回来奔丧。他日学成归国，务必拜马先生为师，学习马先生的学问道德。寿谨遵父训，得了博士学位归国后，挽人求拜马先生为师。马再三逊谢。寿先生说父亲死未能奔丧，如今又不能实

现老父遗命，何以对先人于地下？！竟恸哭失声，长跪不起。马先生深感其诚，只得答允。一时传为佳话。

父亲最喜欢讲的，当然还是他自己从师的故事。“那时我服膺王阳明。”他总是这样开的头，我们也总是饶有兴趣地听下去。原来当年父亲写了一本《阳明学说浅释》，颇沾沾自喜，因慕马先生之名，前去求教。不料马先生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气地说道：“你懂什么王阳明！”父亲不服气，当下开展了一场大辩论。马先生博引旁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凡所引证的论述都能整段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真是古今中外，恣肆汪洋，信手拈来，皆归己用。把父亲惊得目瞪口呆，铩羽而归。从此心悦诚服地拜在马先生门下，终身执弟子之礼，未敢丝毫懈怠。

“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

据说马先生秉赋优异，幼受母教，有神童之称。9岁（虚岁，下同）就能读《楚辞》和《昭明文选》。10岁时，母亲何氏指着庭前盛开的菊花，命赋五律一首，限麻字韵，先生应声而就。诗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羨胡麻。”母亲十分欢喜，说他长大了必能做诗。但又觉得幼年出句竟似不食人间烟火，只怕“一生少福泽耳”。不幸第二年母亲病故。他父亲延聘一位举人来家教读，没有多久老师就提出辞职。父亲以为儿子不听话教，或是家人怠慢了老师，再三追问，方知是学生的才智超凡，老师自愧不能胜任。父亲不信，亲自试教，才相信儿子果然颖悟异常，读书过目不忘，不禁暗暗称奇，自叹弗如。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

马先生16岁参加县试，一篇应试文章全用古人文句集成，竟然天衣无缝，宛如己出。发榜时名列榜首，闾巷流传，人人

惊叹。当时的绍兴名流汤寿潜（哲先）先生大为赞赏，嫁以爱女。马先生17岁结婚，19岁丧父，翌年又遭丧妻之痛，从此断弦未续，一心向学。

当时清廷迫于形势，废科举，兴新学。马先生为探究西方学说，与汤哲先的弟子谢无量一同赴上海学习英文、法文。后来又结识马君武，三人共同创办过《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介绍西方文学哲学。1903年，马先生远游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其间曾去柏林游历，习德文，曾带回一部德文版《资本论》，据传是国内最早的马克思著作。1904年又东渡日本留学一年，习日文与西班牙语。曾从英译本移译西班牙名著《唐·吉珂德》，部分发表在上海《独立周报》上，题为《稽先生传》，可惜没有译完。

马先生周游列国回来，深感清廷腐败，国事日非，于是侨居外西湖广化寺潜心国学。天天到文澜阁借阅四库全书，博览群籍，遍及百家，融会贯通，学乃大进。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已日益高涨。作为一个爱国青年，马先生也深深关注着国家的命运。1907年，秋瑾、徐锡麟二烈士壮烈牺牲，使他极为悲愤，曾赋长诗排律《悲秋》四十韵，中有“雨血天应泣，沉沙地转道”之句，并云“招魂惭后死，无复恫宗周”。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辛亥革命后，浙人改葬徐锡麟遗骸于孤山之阳，马先生为撰《烈士徐君墓表》。

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任首届教育总长，特聘马先生出任秘书长。但他到任不满三周，深恶官场酬酢之虚伪，自叹：“我这人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仍回西湖去读书吧。”就辞职回杭了。从此栖身陋巷，一心治学，以布衣终其身。虽不求闻达而声名日著，海内学者仰慕高风，前来结交问道者日众。后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又请他去文科任教。先生竟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辞之。





“吾与亭”和“有斐石”

我在11岁那年首次见到马先生。那时我父亲任杭州清波中学校长。1935年春，马先生为校园里一座茅亭和竹林中的一块巨石锡名“吾与亭”和“有斐石”，并亲书匾额与题石；竣工之日，又亲临观赏。这使父亲感到荣幸，特地派人把我叫去。我怀着又紧张又好奇的心情走到“吾与亭”山坡前，正是早春时分，抬头望见湛蓝湛蓝的晴空下，两棵高大的玉兰正盛开洁白的花朵，父亲陪着一位老者，在那里端详亭子的匾额。那老者身穿灰布棉袍，外罩玄色马褂，头发浓密，长髯飘拂，头大身矮而相貌堂堂，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气象。不消说，这就是马先生了。父亲看见我，立即说：“小女来了。”一边向我招手道：“快来见过太先生，快行鞠躬！”我赶忙上前，深深鞠下躬去，禁不住心头怦怦乱跳。耳听得太先生在温和地问我几岁了，上几年级，我却心慌得一句也答不上来，只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

亭名“吾与”，那时的中学生其实是不懂的。我也直到后来读了“四书”，才知道典出《论语》，是孔子赞许弟子曾点之辞。与，许可之意。孔子听了曾点不慕利禄而愿意从事教育工作的理想，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运用此典，无疑表达了太先生对父亲从事教育事业的赞许。至于“有斐石”，典出《诗经》“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用在校园竹林里题石，当然再贴切不过了。父亲接办这所中学凡六年，工作正大有起色之时，日寇侵华，杭州陷敌，师生仓皇离散，校舍夷为平地，太先生的手迹亦荡然无存了。





“园绿当门湖一双”

抗战期间，太先生避寇西行，曾应竺可桢先生之聘，随内迁的浙江大学讲学于泰和、宜山，后任四川乐山复性书院主讲六艺。我父亲挈眷避难回乡，在嵊县耕读课女，后辗转任教于浙东各地，与太先生仍一直保持书信联系。虽然烽火连天，交通阻梗，一封信往往一月二月始达，他们却在互报平安之余，仍然从容论学，探讨义理。太先生来书均以上好宣纸书写，常洋洋数纸。父亲奉读再三，什袭珍藏之，未尝或失。可惜后来在“文革”中毁于一旦，令人扼腕叹息。那几年太先生陆续寄来《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等著作。又有诗集《避寇集》，我至今犹记集中一联曰：“山如鹰隼空中攫，船似蜉蝣地上行。”描摹旅途困顿颇形象。

抗战胜利后，太先生返杭，来书邀父亲筹办复性书院迁杭事宜。父亲于1946年春赴杭，联系得里西湖的葛荫山庄作为书院院址。筹措停当之后，父亲留任书院编校。那时我在嵊县中学任教，父亲来信命我辞去教职，到书院读书一年。我正值好高骛远的年岁，喜之不胜，当下束装赴杭。

复性书院坐落在葛岭山麓里西湖畔，西去岳坟约里许，与孤山北麓隔湖相望。透过白堤的烟柳画桥，隐约可见外湖宽阔的湖面。故夏承焘先生过访书院时，曾赋南乡子词，有“园绿当门湖一双”之句。

我到杭后，住外西湖朱文公祠书院宿舍。安顿下来，即由父亲带我去叩见太先生。时值盛夏，山庄嘉树清园，浓荫匝地，回廊曲折，花木扶疏，十分的清幽。我们毕恭毕敬登上太先生居住的西楼，但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父亲轻咳一声，在门边低低叫道：“先生。”只听里面答道：“请进。”进得门去，却见满屋的书架，堆放着重重叠叠的古书。在书的海洋之